

# 漳州：“社区110”化解百姓身边烦心事

新华社福州电（记者郑良、王成）不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区，群众有难事、烦心事，遇险求助，找“社区（乡村）110”，短时间内，“社区（乡村）110”队员赶到现场处置，大量矛盾纠纷被化解在基层，群众得到及时帮助。这是记者近日在福建漳州采访遇到的新鲜事。

今年以来，针对基层治理资源分散、机制不畅、成效不明显等难题，漳州探索城乡社区网格治理模式，在每个社区（乡村）配备1名网格员+1名警员，并建立若干工作队的形式，整合治理力量，回应群众诉求，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 治安环境明显向好

漳州平和县芦溪镇地处大山深处，治安形势一度较为复杂。“警力少，管辖范围广，及时处置，有效管控有薄弱环节。”芦溪镇派出所所长张文伟说，长期以来，村民建房、农地、山地产权等引起的纠纷多发，一些纠纷没有及时处置，民事转刑事案件多发。

“村里不缺治理资源，有村‘两委’，有党员、有退伍军人，有的村还有联防队，但是这些资源没有被有效整合起来。”芦溪镇党委书记吴毅锋说。

今年以来，芦溪镇探索在各个村建立由村干部、村小组长、退伍军人等组成的巡防队，这些巡防队在网格员、警员（两员）直接调度下开展巡逻、治安管控、纠纷调解、险情处置等工作。

两名巡防队员编为一组，轮流在村委会值班，负责接收、处

据新华社福州11月28日电（记者郑良）一家地处闽北大山深处的钢铁厂，资源缺乏，市场、原燃料“两头在外”，却以精细化管理、全流程管控，降本增效，在全国钢铁企业对标中，利润总额、总资产贡献率、吨钢利税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多年保持行业先进水平。

“仅一吨焦煤的运输成本就比同行多200元，三钢只有像‘平原木匠’那样，把手中每一块木材都精雕细琢、用到极致，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站在前列。”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黎立章说。

成立于1958年的三钢，拥有1.6万多名员工，年钢铁产量上千万吨。管理这样的大型钢铁厂，要有“烹小鲜”的精准。

三钢转炉车间，装载20多吨废钢的行车从上方轨道驶过，到达转炉前，下降、停顿、倾倒等流程一气呵成，几乎看不到废料溅出转炉。“工人的每一步操作都有标准化流程图，仅仅行车操控这个环节，就有46份流程图。”车间副主任张祥远指着屏幕对记者说。

什么是最佳的流程操作，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三钢对全厂6000多个岗位进行了详细梳理，以每个岗位现场作业水平最高的员工做法为蓝本，编写初稿，再由同岗位作业人员讨论并反复修改，最终确定为操作规范。

精准评判每位员工表现，以科学绩效管理激发员工积极性和潜力，是“平原木匠”又一“绝活”。三钢总经理曾兴富介绍，通过信息化手段，将岗位标准作业流程中关键控制参数和作业结果作为岗位主要考核指标，实现每个员工在线、实时、量化、自动考核。

以炼钢环节为例，不同钢产品的合金成分有差别，炼钢时，工人将合金成分按比例投入钢水，投放过程、结果由电脑自动记录，比例达标，操作规范，信息系统自动记录工分，和工人奖金挂钩。“收入和自己的表现挂钩，一清二楚。”张祥远说。

记者在三钢采访时看到，技术能手、岗位标兵、劳动模范等员工的照片贴在工厂车间，有以劳模名字命名的工作室。

在三钢中板厂，以省级技能大师叶凌飞命名的工作室，主要从事设备技术革新、管理创新和人才培养。“我们立足培养更多工匠，并将个人的技能绝活和创新转换为公司生产力。”叶凌飞告诉记者。今年来，叶凌飞工作室探索将机械操作和检修两个工种合一，培训员工既操作机械，也承担维修。“将大幅提升设备使用寿命和效率，降低成本。”叶凌飞说。

在三钢，这样的创新每年不下百项。“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是三钢最宝贵的财富。”黎立章说，在三钢人看来，工匠精神最重要的是专注，行业外部环境有高低起伏，关键还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

就在四五年前，受地条钢等落后产能冲击，三钢一度年亏损达10多亿元。“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投入数以亿计的技改和环保资金，三钢本部一年的环保设施运行费用就在8亿元以上。”黎立章说。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清理整治落后产能，三钢的环保、质量、产能优势显现，2018年实现利润101亿元，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保持同类型企业先进水平。

# 老城区基层党建如何破题？

## 辽宁葫芦岛龙港区创新基层党建观察

新华社记者孙仁斌、李铮

人口密度大、党建服务对象多、投入相对有限……面对诸多困难，城市基层党建怎么搞？辽宁葫芦岛市龙港区以党组织领导为核心，通过推进城市党建区域化、行动化、服务化、阵地化、智慧化，实现共建共享共筑共治的党建新局面。

“建区36年，人口扩张了4倍多，常住人口23.3万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和许多一线城市相当。”龙港区组织部部长韩景生介绍说，当地现有基层党组织336个，党员8902人。党员党组织不断增多，全区干部队伍总量并未相应增加，对城市基层党建提出严峻考验。

“基层党建就是一块考验党员干部有没有担当意识、奉献精神的试金石。”龙港区委书记王胜秋说。

——缺人力，当地通过加强党员干部、社区干部、直管党员的培训引导，实现干部“一专多能”。在望海寺街道仙山社区便民服务大厅二楼，墙壁上贴满了社工信息表。记者注意到，其中多名是社区工作人员，他们都取得了社工资格证书。“服务人员有限，我们就发动党员接受社工培训，取得资格证书后，利用业余时间为社区的老人、残疾人等提供必要的帮助。”社区党支部书记于洪莲说。“一专多能”成为当地社区干部的“标配”。

——缺财力，当地党委政府在财力紧张情况下，全力保障基层党建经费，提高社区干部待遇，形成上下同心抓党建的合力。龙港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壮说，区里每年从办公经费中安排专项支出，用于提升基层党建工作者待遇、改善办公条件、便民设施等。目前，已健全了以财政投入为主的稳定的基层组织经费保

置群众诉求。记者在芦溪镇芦丰村村委会看到，每天的工作情况、每一次接处警都在《巡防队工作簿》上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7月15日19时20分，值班人员接到派出所通报的警情，两户村民发生纠纷，聚集不少村民，矛盾可能升级。接警后，最近的两名巡防员5分钟内赶到现场展开调解，随后，多名巡防员和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妥善处置了纠纷。

从治安管控、纠纷化解、风险排查到村里孤寡老人办证买油等琐事，村民拨打“乡村110”或网格员、巡防员电话，都能第一时间得到处置。吴毅锋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全镇各类型案件及信访件下降了80%以上，不少矛盾纠纷多发的村子实现“零发案”。

## 化解群众身边的难事、急事

漳州市芗城区东园社区组建了小区物业、楼管人员、社区干部等在内的21人巡防队伍，过去是公安机关自己去排查隐患，发现案件线索，现在通过“社区（乡村）110”平台，问题、隐患、矛盾主动提供上来，治安水平显著提升。

芗城区巷口派出所副所长陈云城介绍，今年以来，通过这一机制，公安机关打掉了辖区多个电信诈骗、传销窝点，抓获多名逃人员。

在芗城区君临天下小区，记者看到，每栋居民楼外都张贴了“社区（乡村）110”联系牌，上面有小区网格员、社区网格员、社区警员的姓名、电话及微信二维码，可直接取得联系。

“群众拨打110或直接跟网格员、警员联系，就能获得帮助。”芗城区东园社区主任许新红告诉记者，以前社区一共3个网格员，每个网格员分管多个居民小区，服务能力较弱。现在每个居民小区的物业人员、楼长、热心群众等组成了二十人的巡防队，统一工作机制，在“两员”带领下工作，矛盾、隐患刚出现苗头，就能通过巡防员、网格员细致有效的工作加以化解。

## 提升群众安全感、幸福感

目前，漳州已经在全市建立社区（乡村）治理队伍2018支共1.5万多人，实现全覆盖，选配网格员2216人，专职警员2744人。

“两员”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优势，承担采集基础信息、收集社情民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宣传政策法律法规等职责和任务。

各个社区因地制宜，从“两委”干部、物业保安、小区楼长、退伍军人、人民调解员、律师等人员中，选任组建治安巡防队、法律援助队、志愿服务队等队伍。

“通过‘两员+N队’，整合基层群防群治资源，打破了以往出现警情才能拨打110求助的局限，把百姓身边的小事、急事、难事解决在家门口。在社区一级，实现矛盾纠纷有人化解、违法查处有队伍配合、服务群众更加贴近。”漳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黄华安说。

据统计，今年以来，漳州市刑事警情同比下降20%、入室盗窃警情同比下降35%，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达98.23%，创近年来新高。

# 补上回迁居民康养服务短板

## 辽宁抚顺棚改区的民生新事



▲11月25日，在辽宁抚顺东华园社区，几名当地居民表演自编的快板，表达迁入新居后的喜悦心情。新华社记者龚兵摄

新华社沈阳11月29日电（记者熊丰、汪伟）一键拨打紧急电话、凭借GPS为老人出行设定电子围栏……在辽宁省抚顺市东华园社区的智能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手握一个便携式呼救呼叫器，上面只有“拨打、挂机、SOS”三个按钮。“这是社区新引进的智能居家养老项目，又补上了一项为回迁居民提供康养服务的短板。”东华园社区党总支书记王淑华说。

抚顺是典型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因长期的煤炭开采形成了大片棚户区、采煤沉陷区。2004年，辽宁率先在全国启动全省范围内的棚户区改造。东华园小区就是为安置采煤沉陷区搬迁居民建设的，2016年10月交付使用。如今的东华园小区，分布着幼儿园、小市场、公交车站，园区内宽敞干净的柏油路连通着楼宇、绿化区域和健身设施供居民休闲休憩。

王淑华说，避险搬迁不仅给居民提供一个安稳的家，还要让居民住得舒服。“小区现在入住5000多户，其中60岁以上老人有6000多人，医疗康养服务成了搬迁居民的大需求。”

东华园社区智能康养服务的合作方，辽宁省慧明康复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说，智能家居养老服务中心为社区老人提供体检、无障碍洗浴、就餐、娱乐、紧急救助等多项服务。“我们建设了一个智能养老服务指挥中心，老人们拿着便携式呼救呼叫器，遇到危险可以一键呼救。工作人员和家属根据定位，可以快速找到老人。”

记者在现场看到，指挥中心还可以用便携式呼救呼叫器为一些有特殊需求的老人设定电子围栏。以老人的家为中心，划定一个活动范围。老人走出这个范围，子女手机端就可以接到提醒。

记者在东华园小区还看到了有5名医护人员的社区卫生服务站。抚顺市顺城区卫生健康局局长邓昊说，这里与市中心医院建立了联系，可以享受远程医疗服务。

“我们太欢迎这样的服务了。”今年62岁的小区居民张静说，虽然是避险搬迁居民，但是享受的社区服务一点不差，居民们住得安心、舒心。

发展红枣产业，必须转型升级！

2017年若羌开始调整种植模式，加大树距以提高红枣质量，降低病虫害发生率，并在拓宽的林带间进行机械化操作，降低人工成本，同时提倡有机红枣种植模式。

产业结构也开始调整，将全县红枣种植面积稳定在24万亩以内，其他地区则大力发展农区畜牧业、设施农业等。

“刚开始很多人都不理解，种了十几年的枣树哪里舍得为了疏密砍伐。像是又回到了最初种红枣的时候，我们一遍遍下乡，用示范园的成果带动，磨破嘴皮子、踏破脚底子，也要为红枣质量打下基础。”若羌县红枣科技服务中心主任胡文军说。

35岁的华为公司前员工韩玉鹏在枣价最高的时候加入了若羌的红枣产业。从最初开淘宝店卖红枣，到建立自己的小型加工厂，再到阿里巴巴B2B，在全国各地招经销商。韩玉鹏在波折中，将身居沙漠边沿的若羌红枣，通过网络销往各地。

2016年受到枣价下跌的影响，韩玉鹏的公司进入艰难时期。“公司制定了一整套标准，选择肉质紧实、甜度好、色泽好的红枣进行收购，2017年后销售价格基本上没有下跌，去年销量还出现了井喷式增长，更大规模的企业也开始与我合作。”

经历过风浪的枣农们，都在积极找寻新的生财之路。

与宋礼同村的80后陈晓明2015年被县上选中，参加了电商协会培训。

“我都没在淘宝上买过东西，觉得那能卖出去几个枣呢？”几经打听后，陈晓明决定一试，拍照、写软文、上产品、做活动，一步一步摸索，甚至儿子都成了卖红枣的模特。红枣销路越来越好，陈晓明也越来越专业，笔记本电脑、相机、三脚架、补光灯、直播室也开始配齐。

这个害羞的大个子从开始对着镜头说不出一句话，到现在能侃侃而谈几个小时，从红枣种植，到农民生活，他都张嘴就来。自家的枣不愁卖了，邻里的枣也开始通过网红进行销售。

不久前，一场新闻发布会在浙江杭州举行，这是若羌举办的第13届“楼兰文化·红枣节”宣传举措之一。这个边疆大县，正在努力奔小康的追梦路上稳步前行。

（上接1版）2001年春节，若羌红枣发展纲要发布，红枣科技服务中心成立——若羌县红枣产业从此起步。

## 苦心换甜枣

“之前没搞过林果业，这么大批地搞，我也非常担心，也有质疑的声音。但我就想生态好、人民富！”张亚平回忆。

2001年4月，若羌出现倒春寒，气温降到零下2摄氏度，许多在清明前后开花的树都被冻伤，唯有枣树躲过了这次倒春寒。

一场倒春寒的考验，更让张亚平坚定了信心。很快，从河南购买的106万株灰枣苗运抵了县城。

枣树结果需要5年，在没有结果、没有收入之前，如何让百姓相信红枣的价值呢？

“想种的先套种在自家地里，第一年影响的收入由县上和干部筹集奖励。”张亚平说。

即使考虑再周全，推广起来也是困难重重。农民想出了不少办法来抵抗这些看上去会让农田减产的幼苗——有人把幼苗放进沸水里煮了再种，有人放在院子里、房顶上晒枯了插到地里，有人种下之后又拔掉，甚至有农民一棵树也不让进自家的田地。

于是，从县上到村里，干部们扑在田间地头，每人都成了红枣种植技术讲解员，掰着手指给农民们算细账。

一次，瓦石峡镇吾塔木村的村民牛振环堵住了张亚平，开口第一句话就是：“用种粮的地种了红枣，农民吃什么？”

“红枣不但能吃，还可以卖了换钱，盖房、娶媳妇。”张亚平回答。

农民宋礼在干部的宣传带动下，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当年我从宁夏逃荒到若羌，好不容易用30年种好了20亩地，也不是说种枣就敢种的！”宋礼带着满心的疑虑，用村里唯一一部座机，给远在乌鲁木齐读大学的儿子打了个电话，儿子坚定地告诉父亲：别人不种我们种！

树苗刚一种下，邻里的酸话就传到了宋礼的耳朵里：“说我开商店没发财，跑车没发财，养羊没发财，还想种红枣发财？”

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宋礼认真学习种树，每天悉心照料树苗，县工作队发的肥料一点也不浪费。“县上还从河南请来专家，一个村一个村地指点讲解，技术员十天来一次，后来大家都会种了。”他说。与大多数果农一样，他们终于在2005年熬出了头。那一年，他的7亩红枣卖出了3万元。

“我把3万元装到衣服兜里，整整装了一个月，在地里劳动休息的时候就掏出来看一下。真不敢相信，自打种地以来，我第一次手里拿到这么多钱！”宋礼说这句话时，眼睛里的光芒似乎还有当年的喜悦。

在县里的支持下，牛振环也在这一年种上了红枣。“看着别人致富了，农民一下子眼睛就睁开了。”张亚平说。

在第一批枣农的带动下，红枣成了“香饽饽”，人们带着惊奇与羡慕纷纷开始购买枣苗，那一年县城举办的红枣节将这种热情推向高潮。

28年没回老家的宋礼，2011年带着妻子儿女坐飞机回老家探亲。“种地一年能种出来几十万？你种的那是什么地？”——这是老家亲戚最好奇的话题，甚至有人因为好奇，专门来到新疆，眼见为实才彻底相信。

条件好起来的宋礼开始向有困难或需要帮助的乡亲们伸出援手。2003年7月，村民艾拜尔孜·肉孜因家中火灾不幸失明，宋礼当即送去了3500元钱，此后又长期帮助艾拜尔孜修剪、管理枣树。宋礼还组织村里几家种植大户建立了红枣种植管理服务队，逐门逐户传授种植技术，几年下来，累计为维吾尔族枣农开展红枣嫁接工作500多次。

“一个人富不叫富。”宋礼说。

跟宋礼一样，同村的卡斯木·库尔班也曾是贫困户，而今已是红枣致富带头人，用心打理着25亩红枣林。“种枣的技术还是宋礼教的。现在红枣价格按品质论价，得更加科学管理，马虎不得。”他说。

## 转型谋生机

若羌发展红枣尝到甜头后，南疆其他地区积极借鉴若羌经验，红枣种植成为南疆贫困农牧民摆脱贫困的支柱产业。

但在2015年的秋天，转折突如其来。

“枣价一下子跌了。”宋礼回忆。到2016年，最高价曾是200元一公斤的枣价跌至28元一公斤。

供大于求是